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

张　显　清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朝康熙十四年(1675)，原籍直隶容城县，后改入河南辉县籍。十七岁中举，屡经会试不第。明清两代，朝廷多次征聘他为官，他都予以拒绝，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因长期在辉县夏峰村开堂讲学，故有"夏峰先生"之称，其文集也以《夏峰集》命名。

他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当时讲学活动最盛的有三大支。在东南，黄宗羲在浙东证人书院讲学；在西北，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在中原，孙奇逢在苏门山百泉书院讲学。孙奇逢、黄宗羲、李颙被学人尊为清初"三大儒"，①而其中又以孙奇逢的辈份最高，声名最大。他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经勇敢地参加反对魏忠贤阉党和抵抗清军侵扰的斗争，因此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的美誉。②梁启超曾经这样称赞孙奇逢："他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的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③

对于孙奇逢的学术思想笔者曾撰有论文，这里仅着重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办书院　　立学社

明代中叶以后，聚徒讲学之风盛行。正德、嘉靖年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江西创办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在浙江创办稽山书院、阳明书院。王守仁弟子遍天下，他们也到处建书院，立学社，"无日不讲学"，其中尤以王畿、钱德洪、邹守益、欧阳德、徐阶、王艮等最为有名。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恢复东林书院，邹元标在南昌创办江右书院，余懋衡在安徽创办徽州书院，冯从吾在西安创办关中书院。天启年间，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在京师创办首善书院。崇祯年间，刘宗周在浙江创办证人书院。

孙奇逢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先进的人们办书院、立学社的优良传统，积极从事讲学活动。早在明末他便在直隶开始了教书生涯。万历三十九年到四十四年，他寓居京师，经常同鹿善继、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东林党人议论国事，商讨学问，并在家塾学馆中教授生徒。天启、崇祯间，在家乡容城县北城村和定兴县江村讲学，江村书院"天下共仰为传灯之地"，甚至可与王阳明故里姚江媲美，"江村之席，姚江之滨，百有余岁，道域同臻。"④在家乡宝藏寺成立文社，"课子侄辈及从学诸友，肄业其中"，并制定《宝藏社约》十条：立志、知学、改过、求友、虚己、率真、定操、尚齿、肃仪、固盟。⑤崇祯十一年，清军侵掠，孙奇逢率领数百户乡民转移至易州(今河北易县)五峰山，抗战自保。他一面领导大家修武备战，一面"讲礼兴学，育诗读书"，后来弟子们将其讲学之所加以修葺，称"双峰书院"。崇祯末年，在定兴百楼讲学，受业者数十人，习文练武，书声相接。

清顺治初年，孙奇逢拒绝出仕当官，继续在畿辅地区讲学。容城、清宛、雄县、新安等县士

子纷纷从其学习，静修书院、春晖堂、双柳居等都是他讲学的处所。还成立了“十老社”，会文集大，每月一次。他与门人研讨学理，有问有答，记录成篇，逐渐汇集成他的《语录》。

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苏门之后，他的讲学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清朝入关后，疯狂地圈占土地。孙奇逢及其乡亲们的田园也被圈去。他悲愤地告别故土，“携病妻、稺子，张空拳，冒白刃”，向南迁移。亲族、门生数十家也随其南迁。他原拟跨黄河、渡长江，到尚在坚持抗清斗争的东南地区去，但当行至河南辉县苏门山时，由于友人的挽留，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时他已六十有七。

苏门山，又称百泉山，乃人杰地灵之区。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元代著名理学家姚枢、许衡都曾寓居于此。在明代，这里也是文人荟萃之地。孙奇逢到达苏门后，便在百泉书院设坛讲学，并在夏峰村构建“一茅堂”、“兼山草堂”接纳生徒。直至九十一岁逝世，他在苏门地区生活了二十五年，可谓第二故乡。

孙奇逢除在百泉书院讲学外，还成立了“苏门会”、“十老社”、“孟城会”、“洛社之会”等学社组织。这些民间社团的组织是相当完备的。请看《苏门会约》：

卫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灵而聚，地以人聚而益灵。吾党数人，地分四省(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偶来借闲于此，遂尔托契于心。或家嗜烟霞而鸿冥不下，或身经仕路而鹤性难驯，或冷署优游而默探乎学旨，或寒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尘之想。一觞一咏，聊适此日之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之盛事。古人岂难并驾，我辈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会约四条附列于后。

友列五伦之一，以其辅仁也。所关甚重，夫岂容滥。与其交而后择，孰若择而后交？吾侪数人，虽曰寻盟方始，然相闻相信，已有素矣。今仿昔贤洛社香山之意，为苏门之会，思善其乡，以先细民。为之约定交。

礼与其奢也宁俭。当此时，民穷财尽到处皆然，况我辈离家失业者乎？五人一席，荤素六器，饭二，酒随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侬居常与亲友，以此为则。事求可继，道贵相安。为之约崇俭。

拒谏饰非，举世通病。试思大禹闻善则拜，子路闻过则喜，是何等心肠？由衷达外，一毫无所骄饰。非告人以善与过之为难，而有以来人告之为难也。一分谦冲，一分长进；一分倨傲，一分堕落。为之约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挟贵、挟长、挟贤，以至于辞气颜色必欲较量，故交甫合而旋离。侬自愧无闻，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诸公各有己定，不沾沾自多也。为之约忘己。

交之鲜终，由于始焉不戒，我辈不可有慎之。每月两会，疏则情不洽，数则力难继。来不速，迟不候。亭午即集，烛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闻之主会者。或远宾初至，暂尔入会，交从某人起，某亦宜先一日相闻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会，不可轻合；既入会，不可轻离。风俗淳漓，人心厚薄，于此攸关。前说未竟，复为之跋。[8]

这一《会约》的前言部分讲明了立会的宗旨。它由一群虽有用世之才，但却不愿为清廷作官的士子所组成。他们以古代圣贤自期，相互砥砺品德，发明学术，以成千秋盛事。《会约》第一条讲，对入会者必须选择，志同道合者方能结盟定交。第二条讲 办社以崇俭为原则，不得排场奢侈。第三条讲，社员之间要谦和为善，虚心纳谏，不得骄傲自满，掩过饰非。第四条讲，社员要忘己相待，紧密团结，以保社盟永不离析。结束语强调了纪律和制度，规定每月两会，

不得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新人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未履行入会手续者，不得参预会内活动；已入会者，不得随意脱离。此外，"孟城会"还规定，每次集会，与会者应提交文章，就先儒学术及钱谷之事展开讨论。[7]从《苏门会约》中人们仿佛看到了近代社团组织的雏型。它同东林书院等会约一样，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和民间结社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明清时期，社学、府州县学、国学（国子监）是官方学校教育系统，除社学外，学生在校名额都有严格限制。而书院、学社则是私人或民间举办的教育系统，它既教授生徒，又研讨学问，兼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双重性质。私办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扩大社会教育面、传播知识和繁荣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书院和学社的创办还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冲击。封建朝廷对各级官办学校的钳制非常严密，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规定"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8]而私办的书院、学社则相对宽松一些，它们往往不仅切磋学术，而且议论朝政。明末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及复社都是士大夫清流派的议政中心。孙奇逢主办的书院、学社同样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联。他与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鹿善继等东林党人结成"存亡生死之谊"，立志"厘弊剔奸"，"以砥柱中流自任"。他所主讲的江村书院被东林人士称赞为"吾党干城"、"海内冠冕"。他曾率领门人弟子、乡民族众募捐营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自卫反抗清军，被人誉为"鲁卫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10]他隐居苏门，教书不仕，也是对清廷的一种反抗形式，并以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生徒，以致康熙初年又被牵连在文字狱之内。[11]

孙奇逢曾经这样形象地说明举办书院学社的重要意义。他说："两炭相燃，其焰自发；各孤一处，焰立熄矣。"[12]就是说，结成一定的文化群体能够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优秀品德的发扬光大。我国历史上象孙奇逢这样的杰出教育家们正是以他们的可贵的实践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教无类　亦耕亦读

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孙奇逢也继承发展了自孔子以来的优良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教无类，不分贵贱。由于孙奇逢"以豪杰之士，进希圣贤"，因此德高望重，名扬遐迩，拜之为师者甚众。尤其是到了苏门以后，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江苏、浙江、四川负笈而至者达数百人之多，真可谓学子云集，门墙兴隆。在校外随时求教的士人和乡民更是难以数计。这些求学者的政治地位、社会职业、文化层次各不相同，但孙奇逢都平易谦和地向他们传授。他不以讲学者自居，凡来就学者，不分富贵贫贱，官民长幼，贤愚良莠，都"接之无倦色"，"诱掖奖劝，以成就之。""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氓野才，有就公相质者，公披衷相告，无所吝也。"[13]"虽武夫悍卒，工商隶圉，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因此名在天下。"[14]往来公卿，有的不入公署，而造访夏峰草堂，以一见孙奇逢为快。即使对于作过错事的悍夫、武弁，他也不予歧视，劝其从善。有人责备他瑕瑜不辨，门徒过滥，他解释说："与人为善，论其见在，已往、将来，安可必耶？"[15]

因人施教，不主一端。孙奇逢教学，"随人浅深"，按照不同对象，讲解性之所近之理，使之各得其道，而不千篇一律。"其教人，务实行，先彝伦，问答因人，不主一端，矫枉救失，各衷于理"，"故为学者所尊向，称'孙夫子'。"[16]作官的人求教，则教以"爱民"之理，对他们说：

“匹夫为善，康济一身；公卿为善，康济一世。某力不能及民，愿公减一分之害，民受一分之利。”[17]关于宋明理学，是当时讲学者必然要涉及的课题。孙奇逢也是一位理学家，但他不固守窠臼，而是对理学作了通俗的、大众化的解释，并赋予它求实精神，因此一般士子和民众都能接受。在孙奇逢这里，“天理”已不再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而是“无一刻不流行于人伦事物中”，“道在日用饮食”，“日用饮食之间可以证圣”，“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能于日用食息真见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处。”[18]他既认为“天理”是一种精神实体，又强调它离不开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和人的言行，离不开人间的日常生活。他所讲的“理”、“道”，既指封建伦理道德，又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物理”。因此特别提倡躬行实践，反对口头空谈，“生平之学，主于实用”，认为“学问皆从躬行出，而不从口出。”[19]这种理论很容易为普通士民年理解并付诸实行，因此聆听其教者“皆知圣贤之可为。”[20]“圣贤”已不再是少数高贵人物的垄断物，广大士子和普通农夫也可望达到。这无疑也是思想上的一种解放。

授田筑舍，边读边耕。由于清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北方因圈地而失去家业或因不满清朝统治而不愿出仕的知识分子纷纷背井离乡，奔赴苏门，投师孙奇逢。开始他们生活无着，流游不定，十分清苦。后来由于卫河使马光裕慷慨相助，北来流亡之众才得以有田庐度日。马光裕，山西人，在卫辉府任官，清初河南人少田荒，他置田十余顷，并在夏峰村建造房舍一处。后因事罢官归乡，便将田宅赠送给了孙奇逢。孙奇逢又将它们分配给了同来的子侄、乡人及四方麇集而来的门人弟子。这样，其子侄和门人就在苏门地区开始了躬耕自给，边耕边读，以耕佐读的生活。他教导子侄、门生，不耕田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读书治学，因此要努力耕稼，不可小视农亩之事。并且指出，如果孔老夫子亲眼见到今天苏门的情况，也不会再对樊迟提出学习农耕之事进行批评了。他对他们说：“汝等学稼，吾虑汝不明习此事而小视之也。舜耕厉山，尹（伊尹）耕有莘，亮（诸葛亮）耕南阳，此是何等勋业！……今日寄居苏门，不耕无以为养，且无以置吾躬也。不有耕者，无以佐读者，况负薪挂甬，古人何尝不兼尽于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并耕不怠。”[21]“斯时也，假令樊迟为子御而适卫，其所请学者，当更殷，夫子定不曰‘小人哉’，而曰‘隐者也’”。[22]

在清初民族压迫的紧张政治氛围下，在苏门却别有一番平和的景象。一群士子在孙奇逢的教导下，耕稼自给，亦耕亦读，真可谓一种独特的生活。而这种教育方式在古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接触实际，采访风情。这是我国古代学者、教育家的又一优良传统，向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游历同样是孙奇逢治学、讲学生活的重要内容。他身无长物，终身贫旅，到处自适。北自塞上，东临大海，南至伊洛，涉易水，渡黄河，登太行，望嵩山，足迹几遍畿辅、中州。漫游生活使他观览了名山大川，凭吊了历史遗迹，了解了社会民情，结识了名人贤士，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扩展了胸襟，陶冶了情怀，对伟大祖国充满了更炽烈的爱。“耄年仍去国，临路意何穷。大道无南北，吾徒浑异同。酒斟燕市月，帆挂卫河风。非作随阳者，年年伴塞鸿。”[23]这首晚年赠答原籍友人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地不分南北的豪爽之情。接触实际，采访风情，还为他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新安县志》、《苏门遗事》及《容城县志序》、《新乡县志序》都是有关地方史的重要著作，着重记述了“风教攸关”，“民命所系”之事，以收“景前事以为师，综后事而有据”之效。他的《日谱》则是记载他曲折经历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闻，“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闻，或得之目睹，已大半

在吾意中矣。"[24]游历的过程也是接近民众，教授生徒的过程。顺治十一年，游磁州、东昌，所过与人讲学，"望者以为高洁不可及，而即之则甚恭而温，油油然有万物一体、满街圣人之意，远迩迎致之。"[25]顺治十四年，渡黄河，游开封，士人相与攀谈，儿童牧竖也庆幸地说："孙先生来吾家也。"顺治十八年，游嵩洛，士大夫郊迎延留，遣子孙追随问学。有的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前来相见，荣幸地说："异日成人，俾得扬言曰'曾于儿时见孙先生也'。"[26]

孙奇逢的教育对象、方法、途径具有多样化、大众化、普及性、实用性的特点，是对官办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收到了良好效果。

著作等身　桃李芬芳

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孙奇逢教育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教学为其研究提出了新鲜课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有许多著作就是师生问答、切磋形成的；研究成果又为其教学提供了深刻的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他的许多著作实际上就是他讲学的教材。

孙奇逢在教授生徒的同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尤其可贵的是，他在耄耋之年依然潜心学术，自强不已。他在《八十岁自赞》中自豪地说："七十较六十而加毖，八十视七十而加殷，秉烛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27]他的著作达一百六十余卷之多，按内容可分为以下五类。(一)经学。《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四礼酌》等都是他的经学著作。(二)学术思想史。如《理学宗传》、《道一录》、《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等。他是我国古代研究学术发展专史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理学宗传》比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成书早十几年，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三)史学。他的史学著作甚丰，著有《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甲申大难录》、《两大案录》、《乙丙纪事》、《新安县志》、《苏门遗事》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年谱、传记、行述、墓铭等。尤其重视当代史的研究，对明末的动荡、明清之际的鼎革多有记述。(四)语录。这是他回答弟子们提问的记录，对于研究他的思想和教学很有价值。(五)诗文、日谱、书信、杂著等。以上各类著作，后人编选有《夏峰先生集》，十六卷，清道光本；《孙夏峰先生全集》，九十六册，清道光本。此外在《三贤集》中也收有他的著作。

孙奇逢把灌注于这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的学术思想传授给了他的门徒并广泛影响于社会。限于篇幅，本文对他的思想无法展开详论，只能略谈其梗概。归纳起来，他的思想有以下几个特征：兼容并包，朱(熹)王(守仁)合一；躬行实践，实学实用；淬砺精神，培养气节。

明清之际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又一个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时代。面对诸家并起，众说沸扬之势，孙奇逢举起了"兼听并包"[28]的旗帜，欲以推进儒学的发展。他明确提出"学问须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对于不同的儒家派别，应象天地容纳万物，江海汇总百川一样，兼收博采，"相济为用"，而不能"存此一说，便欲废彼一说"。只有这样，学术文化才能不断发展。

孙奇逢以他的"兼听并包"论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朱(熹)陆(九渊)异同"的争论。这个问题从南宋以来一直聚讼不休，至明代中叶又发展为"朱(熹)王(守仁)异同"的争论。到了晚明，这场论争又出现了新的态势。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心学(亦称阳明心学)取代朱熹学说统治社会思想将近一个世纪。但是由于它日益虚无空疏，而在晚明逐步走向衰落。为了寻找拯救国家危机的新的思想武器，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抨击心性空谈、提倡实学实用的实学思潮。[31]而以朱熹之"实"救治王守仁之"虚"的主张则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奇逢便是这一主张的主

要代表人物。

他大力倡导“兼收朱陆，随时补救”。[34]认为只有以程朱之“实”补陆王之“虚”，以陆王之“虚”泄程朱之“实”，“虚”、“实”相济，才能摆脱宋明理学面临的危机。他在深入地研究了程朱、陆王各自的得失及理学发展史之后提出：“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朱熹）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王守仁）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33]孙奇逢虽然在朱、王之间持“调停两可之说”，但是由于明末王门后学“流弊滋甚”，“虚症”是社会思想的主要弊病，因此他更多地吸收了朱熹“务为实学”的思想精华，而摒弃阳明心学中虚无主义的糟粕，把“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35]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正如后人所评论：“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宗旨出于姚江（王守仁）而变以笃实，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旨以弥其缺失”，“生平之学，主于实用”。[36]孙奇逢的“朱王全一”论是对程朱、陆王学说的综合改造，从而把濒临绝境的宋明理学转变为“朱王合一”的新形态。这是儒家学说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又一次转型。

孙奇逢以其弘富的学术成果和开创性的学术思想哺育了明清之际北方一代学人，在全国也有重要影响。黄宗羲说：“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37]《清儒学案》说：在清初三位讲学大师中，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相比，“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38]汤斌、费密、耿介、王余佑、陨崇岱、魏一鳌、耿极、张果中、贾三槐、薛凤祚、马尔楹、高鐈、王之征、申涵光、崔蔚林、赵御众、钱佳选、杜越、李尉、张滔、许三礼，胡具庄、杨思圣等都曾受业于孙奇逢，经其亲炙，“皆负重望于儒林”，成为清初知名学者。[39]真是人才济济，桃李芬芳。“（孙奇逢）承明季讲学之后，气象规模最为广大，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世以比唐初河汾之盛云。”[40]这些弟子中有的成就为清初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有的不仅以学术名于世，而且将其所学施于政事，政绩卓著。例如，汤斌，官至工部尚书，为学以“刻励实行，讲求日用”为宗旨；“出而为政，膏泽及民，清节冠世，独立不挠，儒术之效于斯为大。”著有《洛学编》、《睢州志》、《潜庵遗稿》等，参预纂修《明史》。费密，为学主张“道”能“致用”，反对“清谈害实”，尖锐抨击理学之弊，与李塨相交，著有《中传正纪》、《弘道书》、《荒书》、《燕峰集》等。王余佑，为学“以明体达用为宗”，“究心经史，教授生徒务实学，兼文武才，远近从游者数百人”，与颜元为友，开颜李学风之绪，著有《五公山人集》等。由于有这样一群健将张其军威，遂使孙奇逢学派形成强大阵容，并且“闻其风而兴起者，大河南北代有传人”，其风流余韵传衍于颜李学派，“其功真可远绍濂洛，近比姚江。”

孙奇逢“讲学不分门户，有涵盖之量”。他同一代宗师顾炎武、黄宗羲、傅山及清初著名学者刁包、魏裔介、魏象枢、张沐等都友谊浓厚。其他学派的相互借鉴和友好支援，进一步扩大了孙奇逢学派的社会影响。

孙奇逢以其在学术和育人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的重要历史地位。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教育史上，他都是一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起到了“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使前圣之绝学复续，圣朝之风教渐兴”的连通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桥梁作用。关于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后人多有评论。他的友人魏象枢在一首诗中写道：“翩翩凤翮脱樊笼，启后承先赖此翁。自顾头颅浑自雪，上林犹自问丹枫。”[41]他的学生汤斌说道：“当草昧初开，干戈未戢，人心几如重寐，赖先生履道坦坦，贞不绝俗，使人知正心诚意之学，所以立天经定民彝，不因运会为迁移。振三百年儒者

之绪，而为当代理学之大宗，其于文中紫阳(朱熹)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关于世道，则一而已矣。"[32]

当然，孙奇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的批评还没有达到黄宗羲的水平；对于封建伦理纲常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李贽的水平等。但是这并不会动摇其应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

①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全谢山文钞》卷十三。

②申涵光：《孙钟元先生诔词》，《聪山集》卷三。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④孙奇逢：《鹿伯顺赞》，《又祭鹿太公文》，《夏峰集》。

⑤孙奇逢：《宝藏社十约》，《夏峰集》卷十一。

⑥孙奇逢：《苏门会约》，《夏峰集》卷十一。汤斌：《孙征君年谱》。

⑦汤斌：《孙征君年谱》。

⑧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〇《学校考》。

⑨汤斌：《征君孙先生九十寿序》，《潜庵遗稿》卷一，

⑩钱谦益：《取节录序》，《牧斋初学集》卷二八。

⑪孙奇逢：《日谱》。

⑫孙奇逢：《日谱》卷三六。

⑬魏裔介：《孙奇逢传》，《夏峰集》卷首。费密：《孙奇逢传》，《夏峰集》卷首。

⑭方苞：《孙奇逢传》，《孙征君年谱》卷首。

⑮魏裔介：《孙奇逢传》，《夏峰集》卷首。

⑯刘易：《孙奇逢传》，《夏峰集》卷首。

⑰魏裔介：《孙奇逢传》，《夏峰集》卷首。

⑱孙奇逢：《语录》，《夏峰集》卷一、卷二。汤斌：《孙征君年谱》。

⑲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二五《金铉》。

⑳汤斌：《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潜庵遗稿》卷三。

㉑汤斌：《孙征君年谱》。

㉒孙奇逢：《一茅记》，《夏峰集》卷三。

㉓汤斌：《孙征君年谱》。

㉔孙奇逢：《日谱自序》。

㉕汤斌：《孙征君年谱》。

㉖陈僖：《孙奇逢传》，《夏峰集》卷首。

㉗孙奇逢：《八十岁自赞》，《夏峰集》卷十二。

㉘关于孙奇逢的思想参见的拙文《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论》，《明清实学思潮史》第25章。

㉙申涵光：《荆园进语》。

㉚孙奇逢：《语录》，《道一录序》，《夏峰集》。汤斌：《孙征君年谱》。

㉛关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参见拙文《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1982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㉜魏象枢：《答申凫盟书》，《寒松堂集》卷十。

（下转 116 页）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上)》出版

张　研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上)》已于1992年12月出版。

由清史专家戴逸、罗明教授主编的这部辞典共收鸦片战争以前的有关词 目5032条，涉及到年号、事件、行政建置、人物、官制、军制、法制、史籍、学术、科技、中外关系、社会经济制度、文物、民族等各个方面，是目前唯一一部能够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既全面又简洁、既准确又实用的清史辞典，这对广大清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喜讯。

(上接第85页)

㉝汤斌：《孙征君年谱》。
㉞赵御众：《夏峰集序》。
㉟孙奇逢：《夏峰歌》，《三贤集》卷四。
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子部。
㊲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七《孙奇逢》。
㊳《清儒学案》卷一《夏峰学案》。
㊴参见《清儒学案》卷一夏峰学案、卷九《潜庵学案》、卷二〇七《诸儒学案》十三等。
㊵《清儒学案》卷一《夏峰学案》。
㊶魏象枢：《寒松堂集》卷七。
㊷汤斌：《夏峰集序》。